

新
民
說

海外中国学丛书



女子之不朽

明清时期的女教观念

In Quest of Immortality:

Women's Education in Late Imperial China,

1368—1911

李国彤 / 著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女子之不朽

明清时期的女教观念

NUZI ZHI BUXIU

MINGQING SHIQI DE NUJIAO GUANNIAN

李国彤 / 著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桂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女子之不朽：明清时期的女教观念 / 李国彤著.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10
(海外中国学丛书)
ISBN 978-7-5495-5851-3

I. ①女… II. ①李… III. ①妇女教育—研究—
中国—明清时代 IV. ①G77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200154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中华路 22 号 邮政编码：541001)
网址：http://www.bbtpress.com

出版人：何林夏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广西大华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广西南宁市高新区科园大道 62 号 邮政编码：530007)

开本：880 mm × 1 240 mm 1/32

印张：7.75 字数：210 千字

2014 年 10 月第 1 版 2014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 001~3 000 册 定价：32.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丛书总序

什么是“中国学”？这不是一个可以简单说清楚的问题。中国与海外学术界常见的三个名称——Sinology、Chinese Studies、China Studies——有着密切的关系。Sinology 一般被翻译为“汉学”，是指中国以外的学者对有关中国传统学术的研究，其中尤以欧洲学术界对中国研究数百年的悠久历史，奠定了“汉学”研究的地位。过去的重点在传统的语、文、史、哲学问，“汉学”所牵涉的是传统经史诠释、文字训诂一类研究。

在亚洲地区或汉字文化圈，“汉学”同样是历史悠久的研究领域，其界定也有地域和国情之别。在日本，他们将研究中国传统学术的称为“汉学”(Kangaku)，而将自己本国的语言称为“国语”，研究自己母语的学系称“国文系”。在越南，历史上有一段颇长的时间使用汉字，中国的语文被称为“汉文”，河内的汉喃研究院便收藏了大量古代中国输入的汉籍及越南知识分子研究中国文献的汉文著作。而在大陆，对于中国传统学问之研究，则称为“国学”；在台湾，中文系也称“国文系”，道理是同样的。有些人认为汉学

(Sinology)是近年大陆流行的“国学”的前身,这其实是误解。“国学”是有关自己国家的学问,正如“国语”是指自己国家的语言,“国文”是指自己国家的文学,所以在中国本土,“国学”便指中国的传统学问。

但近年因受到种种因素的影响,被称为“汉学”(Sinology)的传统学术研究,开始发生变化,甚至被质疑其实用价值。为了摆脱其传统训诂考据的形象,海外有些学术机构开始舍弃带有古典意义的“Sinology”而改用范围更广和更具有现代意义的名称——“Chinese Studies”,虽然仍然以语、文、史、哲为主,但同时涉及近现代中国和海外华人的研究。针对汉学的现代发展,海外有些学者提出“新汉学”或“后汉学”的概念,颇有新意,但并未得到广泛的接受。

面对中国的崛起和西方学术潮流的冲击,学术界近年兴起“中国学”(China Studies)的研究,有些学者甚至提出让“中国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建立自己的一套研究方法。“中国学”是“汉学”式微以后在学术界日渐受到重视的领域,范围比“Sinology”“Chinese Studies”更为广泛。除了传统文字、文本的研究,中国学也包括政治、社会、经济、文化、出版、信仰、性别研究或周边关系等领域,举凡与中国有关的课题,纵及古今,横跨中外,都可以是中国学的范围。有些学者认为中国学只限于当代研究,其实并不尽然。从“汉学”到“中国学”,其转变关键,可谓有迹可循。海外对中国的研究,从传统的语、文、史、哲,到走出传统,延伸到现当代的研究,并以社会科学及多元学科的研究方法去探讨中国课题,反映中国研究的新趋势,也突显人文学科面对时代变迁的挑战而迈向更多元的发展。

《海外中国学丛书》的出版,在于联络、组织海外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推介他们的研究成果与方法,作为中外学术交流的平台。同时,在中文已经成为国际上重要的语言的当下,《海外中国学丛书》采用直接用中文书写的著作,以避免文字翻译的障碍。丛书的作者拥有不同的学术背景,他们在国外所接受的学术训练和熏陶,

他们进行研究时所采用的视角和所利用的材料,反映了海外学者研究中国课题的方法和心得。过去学术界常面对学科分类的局限,相关研究往往被割裂出互不相干的成果。《海外中国学丛书》鼓励多元视角和跨领域的研究,突破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的传统界限,从宏观的视野、崭新的角度去探讨中国研究,希望假以时日,集腋成裘,为中国学的建立贡献绵薄的力量。

新加坡国立大学 李焯然

序

李国彤在本书中对明清妇女史展现了独特的研究视野。这一视野是以教育或“女学”为出发点来研究妇女史的。采用这一视野为李著提供了一个颇为有利的基点。跳出“受害者的手稿”(victim script)这一迫使学者回答妇女如何不受压迫的框架,李著探究了翔实的材料,包括为妇女而作的著作、女性作者遗留的作品,或是女性身边的男学者的记录。该书关注妇女是如何受教育的,她们的学习内容 & 写作内涵又是如何影响到妇女觉醒的。

正如李著所言,明清两代所存“女学”作品可谓皇皇,这些作品源自汉唐,绵延不断且与时俱进。由于宫廷官刻和民间私刻的共同推动,这些“女学”作品逐渐成为令人称道的名门望族的教女条规。

诚然,教育是一把双刃剑。箴规之教充斥着禁止、限制和束缚女性言行和思想的规定,而文学之教促进文学表达和书写才能,颂扬历史上颇具影响的女性的作品。文学之教以诗词为主,诗词是最适合女性教子持家的忙碌生活节奏的文学形式。

李著揭示了这一独特的文化氛围如何在女性群体中催生出以

写作求永生的渴望，即追求不朽。毋庸讳言，不朽之志有时会蒙受极端的道德楷模的影响，如福建妇女当众搭台上吊或自殉等等。尽管如此，以文学才情承载道德信念，并使之长存于身后，仍是成千上万才女的向往。那些经由钟爱赏识之士的精挑细选，流传至今的女性作品具有雄辩的说服力。

李著在结尾总结了戊戌变法的影响以及 20 世纪初的社会震荡对中国女学的改造，犀利地分析了这期间启蒙学者对明清女学的终结性的批判。

许多妇女史学者对中国历史上的女教传统和成绩尚知之甚少，李著应该译成英文刊之于世以广启蒙昧。

曼素恩
加州，戴维斯
2014 年 5 月

目 录

导 论	1
-----------	---

女教篇

第一章 “天下无不可教之人”：明清女教书	29
----------------------------	----

- | | |
|------------------|----|
| 一、官、私修订女教书 | 30 |
| 二、明清女教书之嬗变 | 35 |
| 三、女教书与士人家教 | 47 |

第二章 “但求片石志吾墓”：母德与妇道	50
---------------------------	----

- | | |
|--------------------|----|
| 一、母德：操舟渡人 | 51 |
| 二、妇道：节烈与抚孤 | 59 |
| 三、尼冠与妇女的家庭角色 | 69 |

女学篇

第三章 “箴管与彤管并陈”：明清妇女著作中的责任意识 与“不朽”观 79

- 一、咏史：彤管言志 80
- 二、寄外：彤管箴言 86
- 三、教子：箴管慈教 91
- 四、结集出版与追求不朽 96
- 五、余论 101

第四章 “逢君意气投”：明清才女的家庭和交游 105

- 一、一门风雅：以家庭为中心的考察 106
- 二、蕉园·随园：以社团为中心的考察 119
- 三、明珠暗投：才女不幸的婚姻 130

第五章 想象历史和王朝：福建闺秀之居家与羁旅 135

- 一、风土景物 138
- 二、旅居和返乡 142
- 三、亲属网络 147
- 四、闺秀传统及其遗产 152

妇女启蒙篇

第六章 明清之际精英阶层妇女观念的变化 157

- 一、妇女观念的变化与时代思潮 157

二、精英阶层妇女观念的变化	163
三、精英阶层妇女观念之影响	171
 第七章 从跨文化视角反思戊戌时期的妇女启蒙	175
一、族群、宗教、时尚：各种反缠足话语	176
二、跨文化视角：妇女启蒙在民族主义思潮中的变奏	185
三、戊戌妇女启蒙思想的渊源与流变	189
 第八章 知识女性性别角色的现代转型	193
一、家族教育：现代转型之萌发	195
二、男女同校：现代转型之基础	200
三、自由婚恋：现代转型之形成	204
四、时代洗礼：现代转型之成熟	210
 结 语	216
 参考文献	226
 后 记	234

导 论

一、引言：女子之不朽

清代才女吴琪(1644—1661)序《红蕉集》时言及“女子之不朽”，她直言道：“若斯编者，可以传矣。然则古今女子之不朽，又何必不以诗哉？夫抱贞静之姿者，尽不乏批风款月；具挑达之行，或不解赋草题花。彼有大节或逾，而借口一字不逾阃外，其视集中诸夫人，相去为何如也。”^①吴琪批评了妇女诗词付梓有碍妇德的说法，并将诗歌创作提升到“女子之不朽”的高度。这种以著作追求不朽的心理说明妇女具有了“立言”的历史感。

《春秋左传》中有“三不朽”说，即立德、立功和立言。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也列举了“修身、爱施、取予、耻辱和立名”，并指出：“士有此五者，然后可以托于世，列于君子之林矣。”太史公有志于成一家之言，然后“托于世”，“是以就极刑而无愠色”。由此可见，古之君子以著作求传世的执着。民国时期的学者胡适对“三不朽”

^① (清)吴琪：《〈红蕉集〉序》，见王秀琴编《历代名媛文苑简编》卷下，上海：商务印书馆，1947年，第8页。

进行了白话诠释。他说,“德”便是个人人格的价值,使当时的人敬爱信仰,使千百年后的人想念崇拜。这便是立德的不朽。“功”便是事业,替当时的人开一新天地,替天下后世的人种下无量幸福的种子。这便是立功的不朽。“言”便是语言著作,像《诗经》三百篇的许多无名诗人,又像陶潜、杜甫一类文学家,做了几首好诗使千百年后的人欢喜感叹,或在后世影响无穷。这便是立言的不朽。“总而言之,这种不朽说,不问人死后灵魂能不能存在,只问他的人格,他的事业,他的著作有没有永远存在的价值。”^①漫漫历史长河中,立德、立功和立言之“三不朽”已然成了知识阶层男子的人生理想。时间也见证了他们以载诸史册的功德伟绩和汗牛充栋的文章而永垂青史。虽然妇女不能在庙堂之上为天下社稷建功立业,但她们也同样关注着人生的不朽。翻开史册,那些节妇烈女、诰命贵妇以及教子有方的贤母不绝如缕。掩卷扼腕之际不禁令人深思:历史中的妇女是如何考虑人生之不朽的,这种想法又如何影响着她们的生活。

近来,有论者以大量的墓志铭为研究材料,深入地探讨了宋代官绅家族知识妇女对完美的理想人格的追求。研究指出,这些妇女成为相夫教子、家族兴旺的有力支柱和家庭文化传承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她们不仅是时代妇女的杰出代表,而且突破了性别、时空界限,无论是在文学上还是在人格上都是不朽的。^② 比照男子之立德与立功,家庭乃至社会责任感成为中国古代妇女理想人格的永恒主题之一。由于历史久远的原因,今天所能见到的宋代妇女的著作可谓寥若晨星,研究者很难再现这一群体的文学成就及相关的性别语

① 胡适:《不朽》,见《胡适文存》初集卷4,上海:亚东图书馆,1928年,第105—118页。

② 郑必俊:《宋代家庭文化教育的发展与官绅家族妇女》,见燕京研究院编《燕京学报》新18期,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9—67页;郑必俊:《两宋官绅家族妇女——千篇宋代妇女墓志铭研究》,见北京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编《国学研究》卷6,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17—140页;Bettine Berge, “Chu Hsi and Women's Education,” in *Neo-Confucian Education: The Formative Stag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9), pp.325—367。

境。相对而言,灿若繁星的明清妇女著作则为从性别语境入手研究古代社会文化、家庭教育及知识妇女群体的互动关系提供了颇具价值的材料。而这一妇女群体在著作中所表现出的通过写作和结集出版追求不朽的渴望,有助于我们进一步理解中国古代妇女的精神世界。

研究表明,唐宋以降女教书所灌输的正统观念与男文人在传记、墓表中流露出的对妇女的角色期待和评价,分别在训导层、舆论层直接或间接地塑造着社会和家庭需求的妇女角色。古代科举社会对妇女的母教角色日渐重视,文人家庭的女教将诗书声韵和内则箴规并重,寄望她们能教子以书香继世。然而闺秀作家在文学创作中所反映的自我意识明显地游移于女教规范与文学启蒙之间。^①高彦颐(Dorothy Ko)基于对晚明女作家的研究,在《闺塾师》一书中明确指出了妇女写作开启了女子的不朽之门。^②近年来美国学者的明清妇女史研究间接或部分地涉及了相关问题。一些学者或侧重宗教信仰与女子不朽的关系,或从生育和教子的角度入手。^③综观之,在明清历史中妇女试图以结集出版、颂扬母道、宗教修行等为渠道流芳百世。她们对于著作、理想人格以及灵魂的思考明显受到了当时的社会性别制度的影响。因而有必要以“女子之不朽”作为一个内在的文化视角来考察明清以降的中国妇女历史。

本书将从女教、女学及妇女启蒙三个方面逐一考察明清时期女教传统之演变和才女文化之兴盛,并反思清末民初的妇女启蒙观念

① 参见李国彤《分层与整合:明末清初妇女教育观念之衍变》,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硕士学位论文,2001年,第二章和第三章。

② Dorothy Ko, *Teachers of the Inner Chambers: Women's Culture in Seventeenth-Century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p. 243.

③ Susan Mann, *Precious Records: Women in China's Long Eighteenth Century*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Chapter 7; Ann Waltner, "Tan-yang-tsu and Wang Shih-chen: Visionary and Bureaucrat in the Late Ming," *Late Imperial China*, 8.1 (1987), pp. 105—133; Francesca Bray, *Technology and Gender: Fabrics of Power in Late Imperial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7).

及其在民族国家话语中的变奏。明清的女教把妇女纳入到整饬家庭秩序、巩固王化基础的社会系统中。在士大夫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体系中，“正女”被视为齐家的关键基石，更关系到治国、平天下的宏伟大业。无论是女教书的条文，还是文人撰写的妇女墓志碑文，都充斥着对妇道母德的颂扬。在这种大环境下，闺秀才女以妇道母德为行为尺规，并不懈地追求女学。她们在文学创作中陶冶情操、发古今之幽思，并通过著作昭示其责任意识 and “不朽”观。清嘉道以降，中西交会之际，女教和女学受西学东渐的影响而发生变化。尤其是中日甲午战争的失利（1895年）及《马关条约》签订引发的戊戌维新（1898年），这一时期维新派的妇女启蒙则把妇女纳入民族国家话语，沿着女教传统强化妇女的责任意识。女革命者秋瑾在捐躯前的绝命词中表示：“虽死犹生，牺牲尽我责任。”^①秋瑾此言绝好地诠释了在清末的启蒙思潮中，女子以“尽责任”求“虽死犹生”之“不朽”。

璀璨的明清才女文化被以梁启超为首的维新派宣布为“废学”。迎着20世纪初曙成长起来的冰心等一代女作家则开创了会通中西、肩负国家兴亡责任的新女学。在明清女学和民初的新女学之间有着怎样的传承或断裂？明清才女所苦苦追求的“不朽”难道就真的随着王朝的崩溃而不复存在了吗？

二、研究概况：明清妇女的写作、教子和信仰

明清妇女写作和结集出版之盛况已经成了学界不争的事实。但针对妇女作品的出版，时人评论道：“从来妇言不出阃，即使闺中有此韵事，亦仅可于琴瑟在御时，作赏鉴之资，胡可刊版流传，夸耀

^① 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秋瑾集》，上海：中华书局，1960年，第26—27页。

于世乎?”^①这种“妇言不出闾外”的批评让我们清楚地看到,女子以“立言”求传世不朽与男子的“三不朽”有着一定的区别。那么,我们该如何在明清社会性别的语境中进一步挖掘妇女对不朽之追求呢?本节试图透过“女子之不朽”的视角来检讨近年来海内外相关的妇女史研究,以期达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之目的。本节分三个部分论述:妇女写作、教子和宗教信仰。

(一) 妇女写作

女作家对于结集出版的困惑源自女教中的双重观念。一方面,她们受女训观念束缚,觉得“内言不出闾外”,为恪守女子之道就只能将自己一生的心血之作付之一炬;另一方面,诗书之教和文学创作启蒙又赋予了她们历史使命感,在咏史怀古的创作中,历代女杰召唤着她们发古今之幽思。虽不能像昭君那样出塞和亲以平息边塞干戈,也不能像班昭那样兰台续表修国史,她们仍希望其著作能汇入历史长河。她们在序跋中虽然表达了在创作和出版中受到女教的困惑,但是她们最终决定出版作品之举则表明她们没有向女教规范的束缚屈服。不管其文集如何以“绣余”“红余”“焚余”命名,她们还是将“妇言”推出了闾外,并坦言等待采王风者将其作品纳入彤史。

名载史册本身并不简单地意味着不朽。女作家对其作品是否有损妇德甚感焦虑。这一点在盛清时期尤为明显。曼素恩(Susan Mann)注意到妇言与妇德之间的矛盾,并将其放在明清鼎革的大环境中来考察。她指出:

高彦颐以娴熟的笔法记载了妇女诗作所传递出的妇女文

^① (清)清原道人:《吴吴山三妇合评牡丹亭不当刊版流传》,见《听雨轩笔记》,《笔记小说大观》第25册,扬州: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84年,第358页。

学天地与晚明文学氛围的和谐性。但在盛清背景下,妇女的诗词创作发生了变化。它崭露头角,变得惹人争议,引来一些男文人对女作家评头论足。^①

其中以章学诚(1738—1801)为代表。章氏高度赞扬妇女的经学研究,认为她们为传承家学和复兴经学传统做了贡献。他转而批评道:“古之妇学,必由礼以通诗,今之妇学,转因诗而败礼。礼防决,而人心风俗不可复言矣。”^②男文人对妇女写作的焦虑确实影响了妇女自身的创作观念。曼素恩以女诗人恽珠(1771—1833)为例,认为恽珠以“德正言顺”作为《国朝闺秀正始集》的编辑准则显然是受到章氏言论的影响。恽珠拒收名妓的诗作,不为风月之词所动。由此可见,妇德已经成为妇女写作的关注点。

那么,才女们又是如何缓解妇言与妇德之间的张力的呢?参酌以往研究,我将从传播、语汇和主题三方面讨论这个问题。清代女诗人沈善宝在自序《名媛诗话》时曾指出:“闺秀之学,与文士不同;而闺秀之传,又较文士不易。……生于名门巨族,遇父兄师友知诗者,传扬尚易;倘生于蓬荜,嫁于村俗,则湮没无闻者,不知凡几。”^③可见,妇女著作的传播受到很多限制,其传世较之男性士人则难上加难。高彦颐在《闺塾师》中探讨了女作家作品的传播方式。她向我们展示了多个范畴,如家庭圈、亲属圈和公众圈。女作家或单独出版个人诗文集,或将作品附录于家人的文集里,或同好之间相邀联袂结集出版。从妇女不朽的角度来看传播过程,结集出版是妇女写作中的一个关键元素。王献吉在序《焚余草》时道出妇女“焚稿”

① Mann, *Precious Records*, p. 99.

② (清)章学诚:《妇学》,见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卷5,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第537页。

③ (清)沈善宝:《〈名媛诗话〉自序》,见胡文楷《历代妇女著作考》卷10,上海:商务印书馆,1957年,第283页。